

对我国年鉴学发展的思考

周 旭^{*}

摘 要 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肇始阶段、短暂快速发展阶段、缓慢停滞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发展繁荣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曾出版过四十多部关于年鉴学的专著。这些专著,对构建年鉴学学科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现阶段年鉴理论研究仍然呈现“慢作为”现象,既不能将年鉴的实践活动抽象为年鉴理论,又不能通过年鉴理论来指导年鉴实践操作。年鉴学的构建引申出是否有本学科一套专业术语、本学科的理论及其体系、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著作和本学科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等诸多问题,因此,目前尚处于摸索起步阶段,加之历史和传统遗留的系类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年鉴事业的繁荣,给年鉴学的构建带来了机遇,只有在理论、方法、技术和形式等多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突破,才能使得年鉴学的构建和发展成为必然。

关键词 年鉴事业 年鉴学 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兴起了出版年鉴的热潮,同时也兴起了研究年鉴的热潮。时至今日,无论是从实践操作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年鉴热”依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据资料显示,1980年出版的年鉴仅有7种^①,2015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32种、770多部省级综合年鉴,338种、4350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2300多种、1万多部县区级综合年鉴,以及近3000种各级各类专业年鉴。^②伴随着年鉴实践工作的开展,老前辈们对于年鉴的理论探究也在逐渐引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学者即已提出建立一个系统的年鉴研究体系——“年鉴学”。关于“年鉴学”的建构一直是年鉴人孜孜以求的努力目标。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年鉴学”有没有建构起来呢?理论界还在研究和探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

^{*} 周旭,男,陕西省汉中市人,安顺学院档案馆校史办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档案学。

^① 肖东发、陈慧杰:《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1986年第3期。

^② 《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指组字[2016]8号),2016年12月22日。

和年鉴学学科体系”^①;在2016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为进一步推进年鉴事业发展,建构科学系统完备的“年鉴学”学科体系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对于年鉴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如何立足年鉴工作实际,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理应成为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的题中之义。

一、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提出“年鉴”最早见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2年)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无涉。^②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年鉴是舶来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周振鹤在《〈上海年鉴〉(1854)解题》中提出,目前所知,中国内地的第一本城市年鉴应是出版于1852年的《上海年鉴(1852)》,中国第一种城市年鉴是出版于1846年的《香港年鉴(1846)》,而中国第一种年鉴类书籍是由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辑、东印度出版社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1832年英华历书及记录,并附指南》。^③这样算来,中国境内的年鉴编纂历史已有一百八十余年了。纵观其发展历程,可分为5个阶段。

晚清时期(1852—1912年)为第一阶段。目前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年鉴(1854)》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年鉴。《上海年鉴》是关于开埠之后上海的指南,其创办与开埠后不断增多的来沪洋人和洋行有关^④。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于1864年创办出版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至1948年停刊。此外,外国传教士还于1879年编纂了《澳门年鉴》。在1909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被认为是中国人编制的第一步年鉴。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肇始阶段,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影响开展起来的,也主要由外国人开展年鉴实践活动,年鉴事业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出版的年鉴数量也较少。

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年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短暂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年鉴编辑者对于年鉴的定义、分类、地位、作用和与史志的关系等年鉴理论做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同时也对年鉴的选材编纂方法等进行了探索,已经呈现出年鉴学思想的雏形。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世界年鉴》是现知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形式的年鉴。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历法、天象、地理概况、国际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经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以及各国的风俗习惯。1924年,由商务印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64号),2015年8月25日。

② 牟国义:《宋代〈年鉴〉一书考略》,《江苏地方志》2012年第5期。

③ 王继杰:《地方史料价值的认识与研究——〈上海年鉴(1854)〉整理与研究述要》,《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罗婧:《开埠初期的上海租地及洋行——基于1854年〈上海年鉴〉的研究》,《史林》2016年第3期。

书馆编辑出版的《第一回中国年鉴》以及申报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申报年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几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反映中国国情的中文年鉴,历史价值非常大。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编辑出版了八十多种年鉴,分为综合性、专科性、地方性和统计性四大类型^①。其中30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年鉴有:《申报年鉴(1933年)》《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中国保险年鉴(1934年)》《内政年鉴(1935年)》《财政年鉴(1935年)》《世界知识年鉴(1936年)》《江西年鉴(1936年)》《湖南年鉴(193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8年)是年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缓慢发展直至停滞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天津进步出版社于1950年编辑出版了《开国年鉴》。它是建国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主要反映新中国开国大事。其后,大公报社编辑出版了《人民手册》,名为手册,实为年鉴,它从1950年开始,到1965年的16年中出版了15册。……世界知识出版社从1953年开始出版《世界知识手册》,基本上每年一册,1958年起改名为《世界知识年鉴》。”^②1958年7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摄影年鉴》,这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摄影年鉴。1964年,国家体育总局编纂出版了《中国体育年鉴》,这是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权威性工具书。此后,《中国体育年鉴》逐年都有编纂并陆续出版,迄今各年无一短缺,保持了年鉴资料的连续性^③。“文革”期间,仅有科学出版社从1973年起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1种,其余年鉴全部停刊。

改革开放后(1978—2000年)是年鉴发展的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为年鉴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是年鉴事业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年鉴有:1979年继续出版的《科学年鉴》;1980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自然科学年鉴》)等;1981年创刊的《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7种,加上复刊的《中国体育年鉴》,这一年的年鉴累计出版种数较上年翻了一番。1982年,相继创刊了《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印刷年鉴》等13种年鉴,到年底累计出版种数达到28种。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出版年鉴43种,1984年出版62种,1985年出版超过100种,1990年出版超过400种,1999年出版达到1300多种。^④

2000年至今是年鉴发展的第五阶段,也是年鉴事业的发展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年鉴数量不断增长,年鉴质量也在稳步提高。2005年编纂出版约2000种年鉴,到2008年编纂出版2500余种年鉴^⑤,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非公开发行、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⑥。时至今日,2016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第一个全国年鉴工作的规划性文件,即《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

① 邵荣霞:《年鉴、年鉴学及其发声发展》,《广西地方志》1998年第5期。

② 肖东发等:《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③ 刘戈:《〈中国体育年鉴〉编纂问题研究》,《年鉴信息与研究》2005年第4期。

④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⑤ 孙关龙:《年鉴与地方年鉴的比较研究》,《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6期。

⑥ 陆奇:《借鉴方志学建构年鉴学》,《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0期。

确提出了新阶段年鉴工作的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面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推动年鉴工作改革创新,加强对类专业年鉴编纂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加快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包括年鉴编纂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在内的年鉴事业综合发展体系,努力实现全国年鉴事业发展的新跨越。

二、近年来年鉴理论学术专著概览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年鉴学”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仍是一门正在发展完善的学科。在年鉴学的研究中,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学术专著,但对年鉴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没能达成大家都认同的共识。

(一)“年鉴学”的提出时间

关于“年鉴学”的提出时间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有以下一些资料可供参考。

1986年,肖东发提出建立年鉴学,“因为它研究的领域——年鉴、年鉴事业和年鉴编纂活动是有规律的”^①。该文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年鉴事业取得的成绩、在年鉴编纂出版方面存在的问题、建构年鉴学的必要性、对“年鉴学”及其学科体系中基本问题的探讨等。1986年,肖东发和陈慧杰再次提出:“目前已具备了提出建立一个系统的年鉴研究体系——‘年鉴学’的客观条件。”^②该文对年鉴学的定义、任务、属性、体系、意义等都做了相关论述。1986年,程磊提到“年鉴学”^③。1988年,肖东发又提出:“总结探讨年鉴事业编纂活动中的规律,建立一门新学科——年鉴学。”^④1989年,胡均也提到:“重视年鉴编纂实践经验的研讨,开展对年鉴学的研究”,“我们必须继续持久地开展年鉴学的研究”。^⑤另据年鉴专家尚丁在1995年第五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暨中国年鉴研究会成立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了解到在1990年第一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已“提出创建‘年鉴学’的学科”。由此可见,年鉴界提出“年鉴学”这一表述的时间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二)年鉴理论研究的主要学术著作

为便于全面了解年鉴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参考孙关龙和邵长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献检索的角度对近年来专家学者的学术专著进行逐一搜集,得到以下结果:

-
- ①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 ② 肖东发、陈慧杰:《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1986年第2期。
 - ③ 程磊:《浅谈年鉴的定义》,《辞书研究》1986年第6期。
 - ④ 肖东发:《年鉴与社会》,《四川图书馆学报》1988年第2期。
 - ⑤ 胡均:《浅析中国的年鉴编纂出版工作》,《辞书研究》1989年第6期。

著者	著作名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汪田、王秀山、刘龙华	《年鉴编纂实用手册》	吉林白城地委机关印刷	1987 年 11 月
王斌	《年鉴学浅说》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
程磊	《年鉴学》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90 年 10 月
王秀山、刘龙华	《年鉴编纂百议》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
范作义	《年鉴的功能与使用》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
肖东发	《年鉴学概论》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
《广州年鉴》编辑部	《地方年鉴编纂与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 月
中国年鉴研究会	《中国年鉴概览》	华艺出版社	1993 年 5 月
许明辉	《年鉴编纂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李今山、范作义等	《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
许家康、陈延昌、莫秀吉	《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
许明辉	《年鉴方志编纂研究》	民族出版社	1995 年
辽宁省年鉴学会	《年鉴编纂研究》	大连出版社	1996 年 3 月
北京铁路年鉴社	《年鉴编辑工作手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6 年
梁辉武	《地方年鉴学概要》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李宏江、姚洪波	《年鉴编纂论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3 月
李宝昌	《志鉴理论与编纂》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3 月
张炯	《年鉴社会学研究文论》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1997 年 4 月
王砚婷、李今山、李国新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肖东发、邵荣霞	《实用年鉴学》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5 月
郭凤岐、赵继华	《地方年鉴基础知识选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 6 月
马国顺	《史·志·鉴探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陈仁礼、方亚光	《年鉴编纂与经营管理》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许进禄、周斌、刘士贵	《年鉴实用手册》	中国年鉴研究会办公室	2002 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年鉴提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谭惠全	《城市年鉴编纂的理论与实践》	广州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李维民	《中国年鉴史料》	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	2003 年 10 月
李维民、肖东发	《中国年鉴概览》	华艺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
卢德宏	《(柳州年鉴)十年纪事》	柳州年鉴编辑部	2003 年
姚金祥、田骅	《上海市年鉴编纂 20 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4 年 7 月
张崇功	《志书·年鉴编写实用手册》	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4 年

(续表)

著者	著作名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邓振胜	《史志年鉴聚言》	方志出版社	2005 年 1 月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	《郁有满方志年鉴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9 月
刘天明	《年鉴百问》	方志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许家康	《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	线装书局	2006 年 9 月
田嘉	《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方志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张传桂	《年鉴编纂实务》	海风出版社	2008 年
易行	《年鉴编辑手册》	线装书局	2008 年 6 月
阳晓儒	《城市综合年鉴编纂散论》	线装书局	2009 年 3 月
方亚光	《年鉴编纂文论》	线装书局	2009 年 3 月
邵权熙	《行业年鉴理论与实践》	线装书局	2009 年 6 月
卢万发	《中国年鉴学研究》	巴蜀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
唐剑平	《年鉴撰写与编辑:年鉴编撰问题及案例分析》	方志出版社	2013 年 7 月
曲宗生	《积智成朗——年鉴编辑的历史智慧》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肖东发	《年鉴学》	方志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近年来,年鉴界前辈从学理、年鉴编纂、中外年鉴比较、年鉴应用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在业内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下面举要如下:王斌所著《年鉴学浅说》(1989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对年鉴的定义、性质、类型、特点、作用、科学性和信息,为国内首部年鉴学专著。肖东发等所著《年鉴学概论》(1991 年 12 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从历史、理论、事业、方法四个方面论述了年鉴及年鉴事业,既有理论探讨,也有中外年鉴事业的比较,还有年鉴各种表达方式、编纂方法的论述。李今山、范作义等合著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1994 年 10 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论述了年鉴编纂规范化的理论依据、内容和途径,阐述了年鉴的框架设计、选题、条目、百科部类、资料部类、专文、大事记、文体语言、图表、检索系统等诸方面的规范化,对于年鉴的编纂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肖东发、邵荣霞所著《实用年鉴学》(2000 年 5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基础理论、编撰要素、焦点问题、精品策划等四个部分,用信息论、传播学的理论重新给年鉴进行了定位,并对年鉴的框架设计、专文组织、条目撰写等编纂要素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还论述了计算机技术在年鉴编纂中的应用、电子版年鉴及光盘版、网络版年鉴的出版和经营等问题。许家康所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2006 年 9 月,线装书

局出版),以古今中外不同类型的年鉴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年鉴的一些基本规范问题,对年鉴的编纂行为进行了规范。唐剑平所著《年鉴撰写与编辑:年鉴编撰问题及案例分析》(2013年7月,方志出版社出版),分别从年鉴知识、年鉴撰写、撰写问题、语言表达、规范表述、标点符号、案例分析(单一性条目)、案例分析(常规性条目)、附录九个方面论述了年鉴的撰写与编辑。肖东发等所著《年鉴学》(2014年4月,方志出版社出版),从年鉴的历史、理论、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三、对年鉴学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相较于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年鉴理论研究处于“慢作为”的状态,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于年鉴理论的需求。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既不能将年鉴的实践活动抽象为年鉴理论,又不能通过年鉴理论来指导年鉴的实践操作。究其原因,一是源于年鉴理论研究时间短,理论探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理论积淀不够;二是年鉴理论研究的方向不明确,滞后于处于变化中的年鉴实践;三是中青年年鉴理论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和素养不高,缺乏年鉴实践;四是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手段的能力不足。

基于研究现状,学界应该再次审慎地看待“年鉴学”的建构。现阶段,年鉴学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年鉴学范式”,还没有组成“年鉴学科学共同体”。^①笔者认同孙关龙关于建构学科体系所持的态度,既积极乐观又严肃慎重。不妨依据孙关龙关于称“学”的四条标准,再对所谓的“年鉴学”加以考察。首先,“年鉴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概念体系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年鉴学”的概念体系还没有形成,甚至于还没有一定量的年鉴学科所特有的概念,呈现出与方志学、编纂学、报刊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度不大的问题。其次,“年鉴学”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及其体系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现有的研究往往偏重于从年鉴实践中总结经验,而缺乏“形而上”层面的深层次理论探索。同时,在年鉴理论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方面和在年鉴学实践运用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滞后。再次,“年鉴学”是否有社会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呢?公允地讲,在长期的年鉴研究中,年鉴界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功底深厚、学术素养一流的年鉴学者。人才匮乏,特别是理论研究能力强的人才已经成为构建“年鉴学”的重大瓶颈。最后,“年鉴学”是否有学界公认的代表性著作呢?孙关龙认为,“中国年鉴当前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②,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从近年来发表年鉴研究的文章或学术专著数量上来看,是呈现下滑趋势的。从所发表论文或学术专著的质量上来看,很少有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呈现出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更是匮乏。更让人吃惊的是,笔者通过检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检索中国知网、超星电子图书等,只能够检索到近几年少量的有关年鉴学术研究的专著。因此,建构“年鉴学”还“任重而道远”。

① 王照伦:《对年鉴学研究的透视》,《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孙关龙:《铸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及其年鉴学》,《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2期。

尽管如此,建成“年鉴学”学科体系仍然具备充实的基础。“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需要明确“年鉴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即探讨年鉴及年鉴事业的发展规律、规范年鉴编纂的方法、总结年鉴实践的经验、指导年鉴活动的开展、提高年鉴的社会价值。^①一是要不忘初心,从“年鉴史”的角度做好年鉴“回头看”工作。年鉴传入我国已有一百多年了,所走过的这条“年鉴路”值得审视。年鉴属于“舶来品”,要想在中国社会取得发展,应该走中国化道路,但又不能改变年鉴所特有的属性和特点。二是要抛开争论,拓宽年鉴研究的领域。在年鉴研究中,存在很多不同观点,甚至对于年鉴学的定义等都存在争论。学术研究需要争论,争论有助于年鉴研究,但不能思维拘泥于争论,而应在争论中拓展对年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年鉴学研究的内容上应有转向,由之前经验性、描述性、单向性的研究转向论述年鉴学的内涵、从哲学的高度探索年鉴学的本质理论,并采取多向度的思维、方法和手段来开展年鉴研究。三是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思维,开拓性地开展年鉴学研究。要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共享经济思维等开展年鉴学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改变之前把年鉴学研究领域局限于封闭小圈子的做法,开拓年鉴学研究的新领域,要大胆引入社会力量开展年鉴研究。四是要耐得住寂寞,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工作。尽管“年鉴学”学科体系亟待构建,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在现阶段“年鉴学”研究中,夯实“年鉴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比如,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等的提出,基础理论分支学科的建立,年鉴学领军型人才的培养,等等。五是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集中力量在年鉴学部分领域的研究中率先打开局面。做好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针对阶段性目标,设立可行的科研攻关课题和规划项目,积极鼓励和引导年鉴工作者参与年鉴理论研究,能够从更广、更深层次提高年鉴学研究水平,推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高质量学术专著。

在新时代,要取得年鉴事业的更大进步和年鉴理论研究的更大突破,需要依靠全体年鉴人在实践层面不断地提高年鉴编纂的质量、拓展年鉴的范围、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新形式,需要依靠专家学者在理论层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年鉴理论研究,推动建立一门科学、系统、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

责任编辑:冷晓玲

^① 肖东发:《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1986年第3期。